

系统观视域下我国军民 融合发展研究

刘祖辰 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系统观视域下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研究

刘祖辰 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系统观视域下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研究/刘祖辰编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682 - 6641 - 3

I. ①系… II. ①刘… III. ①军民关系 - 研究 - 中国 IV. ①E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9965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8.75

字 数 / 153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00 元

责任编辑 / 潘 昊

文案编辑 / 潘 昊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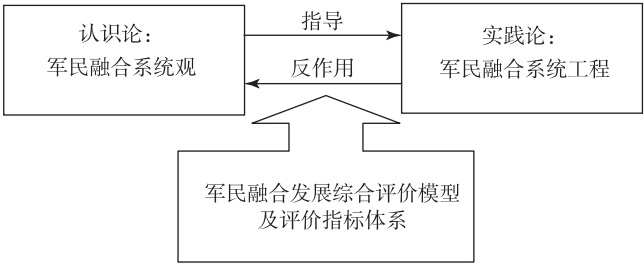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系统观属于系统科学中的哲学领域，也称系统论，位于系统科学的学科体系之首，任务是从哲学高度论系统，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系统科学的全部成果进行哲学概括，为系统科学研究和应用提供哲学指导。在系统观视域下，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行研究的主要功能是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探求军民融合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此指导军民融合实践，使政策制定得更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实效性。

在系统观视域下，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及其发展程度进行研究，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在系统科学的基础上，构建起军民融合系统观认识论的理论框架；二是以系统工程为指导，构建起军民融合系统工程实践论的基本框架；三是构建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这既是对军民融合系统观认识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对军民融合发展实践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总结，由此搭建起军民融合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理论桥梁。

本书的逻辑路线如下：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002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004
第三节 运用系统科学研究军民融合发展问题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012
第二章 理论基础	015
第一节 国防经济规律	016
第二节 战斗力生成规律	021
第三节 系统科学基本理论	029
第三章 认识论：军民融合系统观	043
第一节 概论	044
第二节 复杂巨系统：对军民融合本质属性的认识	046
第三节 系统整体性：对军民融合发展历史脉络的另一种解读	050
第四节 开放与封闭：对军民融合程度的思考	053
第五节 自组织协同：对军民融合主体间作用关系的分析	057
第六节 竞争与协作：对军民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的微观解释	060
第七节 军民融合系统发展的“序参量”：试论整体国家安全观的 培育	062

第四章 实践论：军民融合系统工程	065
第一节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067
第二节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工程	069
第三节 实施军民融合系统工程的几点思考	070
第五章 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价	075
第一节 基本思路	076
第二节 评价指标的遴选	079
第三节 指标权重的确定	087
第四节 评价模型的构建	089
第五节 评价方法的选择	095
第六章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几点思考	111
第一节 以系统思维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112
第二节 合理界定核心军事能力生成与非核心军事能力生成的 范围	117
第三节 厘清军民融合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边界	120
第四节 处理好分散创新与协同创新的关系	121
第五节 扎实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建设，实施军民融合 大数据系统工程	122
参考文献	124
后记	130

[illegible]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军民融合发展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安全和发
展全局，全面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新时代。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三次强调“军民融合”：明确了“军民融合”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五个更加注重”之一；明确了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特别是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并列，作为国家必须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的一部分，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18 年 3 月 2 日，第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确立了军民融合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发展原则、重点任务、主要途径等，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的航向航程。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抓实干，紧抓快干，不断开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局面。”在此后不久，2018 年 3 月 12 日，习近平同志在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扎扎实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2018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从2013年两会至2018年，习近平同志连续六次参加解放军代表团（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会议，连续六次发布重要讲话提及军民融合发展。可以说，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已经步入空前发展的机遇期，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亟待理念突破与新的实践作为。

二、军民融合发展进入攻坚期

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军民融合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障碍、利益樊篱依然存在，融不起来、深不下去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思考其主要原因，一是以整体国家安全观、发展观为核心的军民融合思想自觉尚未形成，导致军民融合行动自觉难以实现；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军民二元分离运行机制仍然存在很大惯性，军民分离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打破，导致军地之间供求底数不清、衔接渠道不畅通、运行方式不兼容等问题仍然存在；三是军民融合政策制度环境亟待优化，尤其是军民融合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导致军民融合中各主体行为缺乏合理明确的规范，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还要靠觉悟、靠感情、靠关系，无形中增加了融合成本，抵消了融合红利，影响了融合信心与发展动力。当前在军民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军民融合发展正进入从浅层次融合、物理板块式融合向深层次融合、化学反应式融合转变；正进入由少数领域、几种要素、一些部门的局部融合向全要素、多领域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转变。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已经到了转型期，进入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关键期。

三、军民融合发展理论相对滞后

新时代对军民融合理论发展提出更高、更紧迫的要求。随着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场宏大的军民融合实践正在这个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国土面积世界第三的超大型国家全面展开，众多企业、各个区域和各相关部门都在谋求军民融合发展，军民融合发展渐成全国大气候。^①在这场宏大实践活动中，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前面，理论研究明显滞后。时代强烈呼

^① 姜鲁鸣，王伟海，刘祖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探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唤着军民融合战略理论的发展，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复杂巨大的战略管理工程，蕴含着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军民融合“普通话”语言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一些官方语言体系，但在阐释理解上并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还处于“百花齐放”的阶段。理论上的不统一、不完善，使得各融合主体在实践推动过程中，难以达成思想共识和情感共识，出现“说的是军民融合同一句话，但想干要干的却不是同一件事”的情况，使各融合主体间难以形成合力。

另外，我国军民融合推动到了一定阶段，需要一套指数体系来衡量评估，这成为当前军民融合研究亟待突破的瓶颈。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价研究相对滞后，在把握军民融合发展现状、难点以及未来施力的关键点时，只能依靠情况概括、模糊地把握，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缺失，使在监察军民融合落实情况时，难以形成有力抓手，只能依靠定性描述，实操性大打折扣。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将“军民融合”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从按照时间序列排序的文章列表可以看出：对军民融合的学术研究大概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军民融合基本内涵，到运用不同学科理论工具对军民融合发展机理进行探讨，再到目前以阐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内涵与实施对策为主的脉络。这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即现实—现象—本质—指导现实的逻辑顺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对“军民融合”认识与把握的前两个阶段过程中，存在着分散化与略显随意性，即没有对军民融合实质属性以及发展机理形成体系认识，只是在学界达成一些点面上的基本共识。反而是对军民融合实践进行了较多有益的探索。总的来看，军民融合理论研究已经明显走在了实践发展的后面；而作为检验和促进实践发展的手段，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估的研究，更是走在了理论发展的后面，成为在军民融合研究中亟待突破的理论空地。

一、军民融合理论研究

（一）军民融合的概念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

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以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常常同读者站在同一立足点上。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可以说，军民融合概念的界定是军民融合研究的基础。

一些学者认为军民融合发展思想主要源于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 1994 年 9 月提出的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的建设思路，强调要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CTIB）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NTIB）。一些学者则从推进科技资源共享、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军民融合”的概念，认为所谓“军民融合”，一方面是“军转民”，要改变过去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高新技术完全禁锢在军事领域的做法，在军用技术开发之初就同时考虑它的民用前景，以便使之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转化为商品，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民转军”，国防科技开发部门没有必要什么都从头做起，另起炉灶，而应注重采购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高新技术及其“货架产品”，用于发展新式军事装备系统。

从根本上说，军民融合体现着一种现代国家治理方式。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就是要破除军和民之间的二元分割，充分实现经济和国防两大建设发展进程同步、资源配置均衡、要素关系互动、政策制度兼容、国内国外统筹，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进而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①

（二）军民融合的内涵

军民融合中的“军”是指国防和军队建设，涵盖“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设施、国防动员、国防教育、国防资源以及边海空防”等内容。军民融合中的“民”是指在经济社会体系中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紧密相关的领域，比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紧密相关的国家科技和工业体系，与军队人才培养紧密相关的国家人才教育和培养体系，与军队保障紧密相关的国家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与国防动员紧密相关的国家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与新质战斗力生成和提升相关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

军民融合发展，就是按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大体系之间的相关性统筹配置军民两大体系资源，通过融合共享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双向互动的生产力、战斗力和科技力，做到一份投入、多份收益。其核心要义是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子系统有机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母系统，使二者相互融通、相互支撑、

^① 姜鲁鸣，王伟海，刘祖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探论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相互促进，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防经济效益，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本质要求是优化资源配置，使资源效能最大化；根本目的是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三）军民融合的外延

军民融合的外延包括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与经济建设相关的所有领域、范围，具体体现在军民融合发展“6+3+1+N”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的体系框架，形成“6+3+1+N”的军民融合发展总布局。具体来说，“6”是指“六大体系”融合，即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3”是指“三大新兴领域”融合，着眼谋取战略竞争新优势，推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的军民融合，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融合发展布局；“1”是指“走出去”融合，即着眼有效维护我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统筹经济和军事走出去，为国家海外利益拓展提供安全保障；“N”是指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军民融合的新领域将持续拓展，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军民融合将层出不穷。其中，“六大体系”融合是基础和支撑，是从国家安全和全局的角度对军民融合进行的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三大新兴领域”融合是战略制高点 and 未来引领，从谋求战略竞争新优势的角度指明了军民融合跨越发展的方向；“走出去”融合是空间延伸和海外布局，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角度，致力于增强军民融合的内外联动性、形成海外延伸的新格局。“6+3+1+N”的军民融合总布局将汇聚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

（四）军民融合的原因（重大意义）

从根本上讲，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与之相关的战略决策，自然成为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本源性和基础性问题。从历史纵向维度看，这是国家产生之后的古老矛盾；从空间横向维度看，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论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有何异同，统筹协调这一关系却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在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新军事变革的驱动下，各国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需求日益增大。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主要表现在从平台中心战到网络中心战，从单一战场到陆、海、空、天、电全维战场，从近距离搏杀到非接触精确打击，从单一兵种作战到体系对抗，等等。无论从战争准备还是战争消耗来看，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

对国防建设需求的约束作用越来越明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国家综合实力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一体化发展，使军事崛起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注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和溢出，最大限度地发挥强军对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拉动，比如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投资、扩大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成为美国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始终保持发展强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核心要义是实现富国强军、民族复兴，实现赶超发展的道路选择。其中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军民融合关乎国家兴衰；二是军民融合关乎军队强盛；三是军民融合关乎国际竞争胜负。总之，在战争形态信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高度市场化时代条件下，我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持久优势，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五）军民融合的模式（形态演变）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都认识到军民融合是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最优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协调和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的许多“高、精、尖”技术，都实行的是“先军后民”政策，都是军用开发在先，成功后再向民用推广。冷战结束后，美国全面实行“军民一体化”政策；欧盟主要国家、日本也开始调整国防工业结构，逐渐走向军民一体化发展道路。从总体来看，美国“军民一体化”模式，主要是“国防部主导，民为军用、以军带民”；欧盟“军民一体化”模式，主要是通过欧盟成员国的相互合作，对国防工业进行调整改革，推动欧盟成员国国防工业与市场的一体化，加强军政部门间和企业间的合作，充分利用现有成熟的民用技术，大力推行民技军用，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两用技术和资源双向转移之门，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俄罗斯实行“军民并重”的发展模式，实际是一种既想避免军民分立弊端又不想放弃独立军工体系的折中做法，最终目的是保持军事技术优势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为本国的装备建设和巩固大国地位服务。以色列实行“以民带军”的发展模式，把国防工业作为本国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先导，扩大军事技术成果的利用，并将部分军工企业转为民间经营，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利用国防投资来开发生产民用产品。日本实行“以民掩军”的发展模式，是指在军力发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使民用生产中蕴含着巨大的军事生产能力，依靠民间企业发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做法。

在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大概经历了从军民兼顾、军民结合、军民融合，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写下不朽名篇《论十大关系》，其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同年，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二机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学习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军事产品本事的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受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实行的是一种军民相对分离、自成体系的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做出了新的探索。邓小平同志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同时要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他指出，国防科技工业要“从搬用的苏联制度中解放出来”，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新形势下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了新的探索和回答，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为必须坚定实施的七大国家战略和“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并写入党章，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新时代。

二、军民融合实证研究

（一）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对军民融合评价进行了一些很有探索性的研究，其中较多研究集中在对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效益进行评估，并且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和评价指标体系。例如，杜人淮、马宇飞（2016）从军民融合广度水平、层次水平、深度水平和整体水平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哈尔滨工程大学（2015）借鉴国外军民一体化发展潜力评估和开展军民融合发展工作的经验，以及通过对区域军民融合发展规律的探讨和研究，从融合基础、融合深度、融合效果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肖振华、吕彬、李晓松（2014）在《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

系构建与优化》一书中对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效益评价，是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效益评价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分散于对其他领域军民融合效益进行的评估。例如，刘宁、李辉亿（2012）对军队装备人才培养军民融合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乔玉婷、鲍庆龙、曾立（2015）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绩效评估及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合作伙伴协同配合度、协同创新主体能力和协同创新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对长株潭地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院、军民结合产业园与企业的协同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估。游光荣、赵林榜（2017）在《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构建五个评价指标用来评价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程度。孙劲方（2013）提出“区域经济动员融入度”的概念，是指区域经济能够用于动员建设的范围和程度；并提出资产专用性是制约经济动员融入区域经济的物理技术障碍，以及可用资产转换系数^①来衡量区域某一产业的动员融入度，不同类型产业适用于动员建设的资产专用性和动员融入度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资产转换系数；并对区域产业动员融入度进行了静态、动态分析并构建出区域经济动员融入度模型，从理论上阐明了区域经济动员融入式发展的最佳融合范围。其余研究则关注对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总体评估。例如，姜鲁鸣、刘晋豫（2009）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一书中，在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内涵界定之后，剖析两大建设协调发展具有的层级结构，引入“协调度”的概念，并据此构建出评价指标体系。“协调度”的评价由五个子系统构成，分别是“战略目标”“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产业能力”和“技术形态”。在这五个子系统中，“战略目标”体现着国家意志，处于最重要的地位；“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用于分析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处于次重要地位；“产业能力”和“技术形态”是大国进一步追求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度”的评价建立在每个子系统“协调度”的基础上，将“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作为第一体系，其余作为第二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确定第一体系和第二体系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进行综合评价。阮汝祥（2009）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军民融合机制进行评价并构建出指标体系。从经济性、技术性和制度性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运用评分评价法，对民用单位参与国防科技工业效果，即国防工业产业领域军民融合中民参军进行了评价。李健等（2012）提出军民融合度是反映军民融合程度的量值。它包含微观军民融合度、中观军民融合度和宏观军民融

① 书中定义资产转换系数为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

合度三个度量维度。其中，微观军民融合度是基于个体而言，中观军民融合度是基于总体数量而言，宏观军民融合度是基于整个系统而言，并构建了三个度量维度的军民融合度的计算公式（度量方法）。马喜芳、郭世贞、张天辉（2017）基于BSC等西方绩效评估理论，构建了一个区域层面的军民融合绩效评估体系，包括三级指标库及BSC战略地图，将军民融合区域战略目标分解为4个维度，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62个三级指标，每个维度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内部因果逻辑关系，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综合评估进行了较为有益的研究。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军民融合度研究主要以美国技术评价局1994年《军民一体化潜力评估》为经典，报告根据对美国国防工业军民一体化潜力的评估，提出美国分阶段实施军民一体化的三步策略，包括调整、改革和重组，详细分析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并且对不能实行一体化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部分即仍需要分离的部分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在荷兰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terprise and Industry《安全领域军民协同研究》中对安全领域军民协同研究的评估从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团体的视角进行：①行业（民用安全产品和军事产品的生产者）；②用户（民用安全产品和军事产品的最终使用者）；③社会整体。且影响评估的关键是政策选择与基准情况相对比，基于此构建出不同政策选择的评价框架，并对不同行业领域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对军民融合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美国国防部认为，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历来都来自中小型公司，这些新兴的国防供应商将对未来战场做出重要贡献。美国通过重组国防部投资、预算和采办过程，要求主承包商须将所获得合同的2/3~3/4交由分承包商承包，积极引导和鼓励掌握创新技术的中小型公司进入国防领域，旨在形成更广泛、更有竞争力、更富有创新活力的国防工业基础。英国国防部装备、保障和技术大臣菲利普·邓恩认为，“中小企业对英国国防和安全要求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是一股创新的源泉”。

三、现有研究述评

有关军民融合发展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引起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整体尚处于初创阶段，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1. 缺乏较为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

一种理论、一个学科都是一套概念和命题体系，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表述。欲掌握该理论或学科，必须掌握它独有的语言。当前，在军民融合理论研究中，对核心概念的界定是空白的，还没有构建出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还没有发展形成军民融合理论研究的语言体系。这一方面导致军民融合理论研究较为分散化，难以形成军民融合理论研究的合力；另一方面，在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过程中，由于系统理论的缺失，军民融合各主体的行动缺乏统一理论作为指导，进而形成思想上、行动上的各种因“口径不一”而衔接不畅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问题”“政策性问题”。

2. 研究方法较为局限

目前军民融合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经济学方法上，如曾立、胡宇萱（2017）从“委托—代理”视角对军民融合管理机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孙武斌、李正齐（2017）从产业融合视角对军民技术融合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王海涛（2016）基于军民融合的供给与需求，提出军民融合全要素的分析框架；赵黎明、孙健慧、张海波（2017）运用博弈论方法，分别考察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中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在 Nash 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 主从博弈和协同合作博弈三种情形下双方的最优策略、最优收益及体系整体收益情况，以研究二者的技术共享问题；孙劭方（2013）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构建基于资产专用性的区域经济动员融入度模型，对区域经济动员融入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等等。

还有一些研究则零星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军民融合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李志新（2017）借用 DA（Dynamic Alliance，动态联盟）理论，分析了 DA 与工业动员军民融合发展模式的内在联系，提出在 DA 视角下工业动员军民融合发展对策的建议；张兆垠（2011）对中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特性进行了 SWOT 分析，对军民融合战略设计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章磊、张诤敏、闫莉、田海堂（2016）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2000—2004 年中国学术期刊网出版总库收录的军民融合相关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分析，揭示了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现状，探讨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分别运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虽然能够对军民融合某一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但是缺少对军民融合的系统研究。这些零散分布式的理论研究，由于运用方法不同，难以从整体上聚合，发展成为支撑军